

导言：一个奇特的 文化保守者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文化逐渐遭到来自西方异质文化的有力挑战，从而开始了近代中西冲突与融合的文化发展史。在这一历史过程的演进中，如何认识、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便成为近代文化思想和运动持久不变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曾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文化派别和思想人物，他们以其独特的思想和活动，在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迹。其中，属于文化保守派之列的辜鸿铭就是很为突出、很值得研究的一个。

提起辜鸿铭，现在也许有不少人感到陌生。但在70年前 若要不知道辜鸿铭，不晓得他“随地吐痰是中国人注重精神生活表现”的奇谈，未听说他关于纳妾制合理的怪论，以及他对小脚的嗜癖和他那自鸣得意、与世抗争的辫子的故事，怕是显得有些孤陋寡闻。1956年，辜鸿铭当年的北大同事徐子明先生，曾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令人难忘的辜氏肖像：“枣红色的旧马褂 破长袍 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面是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脚下，终年一对双梁布鞋”。^①这就是他 1915年至1920年所见到的

^① 转引自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台湾《中央日报》1956年 7月 4 日。

辜鸿铭。对于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奇人怪士，人们对他若是没有深入了解的欲望，当是不可思议的。

辜鸿铭 名汤生 英文名为 Ku Hong-Ming，别署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同安。^① 1857 年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他的曾祖父名叫辜礼欢，曾首任英属马来半岛的“甲必丹”，^② 家族从此兴盛。辜礼欢生有八子三女，子女中最有出息的是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辜安平自幼被送往国内读书，得中进士后在林则徐部下为官，后调职台湾并定居下来。其孙辜显荣和曾孙辜振甫在商业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声誉卓著。辜国材和辜龙池在政治上也都有所作为。辜龙池就是辜鸿铭的祖父。他的儿子也即辜鸿铭的父亲叫辜紫云，以经商垦植为业。他帮英人福布斯·布朗 (Forbes Brown) 管理一个名叫“牛汝莪”的橡胶园，担任经理，由于勤勉忠厚，深受布朗信任和器重。辜鸿铭是紫云次子，其母为西洋人，所以生就一副蓝眼睛，加之聪明伶俐，也甚得布朗夫妇喜爱，被收为

汤生，是辜鸿铭的英文名 (Tomson) 的汉译。据他的马来亚华侨同乡伍连德博士回忆说，他在槟榔屿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Koh Hong Beng (见伍连德：《瘟疫斗士》英文本 1959 年英国版第 305—306 页)。1990 年，我和马克锋同志曾专门致函爱丁堡大学英文系主任杰克教授了解有关辜鸿铭就读爱丁堡的有关档案材料。杰克教授委托包夏林 (译音，原名为 Hsia-Lgann Bao) 先生代为查找。包先生给我们找到一个名叫 Hong-Beng Kaw 的人，并将其搜集的档案材料寄给了我们。经核查，此人即是辜鸿铭。我的导师龚书铎教授 (福建人) 认为，Koh (Kaw) Hong Beng 是辜鸿铭的闽南方言译音。台湾学者吴湘相也持此看法。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 (Tomson Ama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的《辜汤生传》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因为厦门旧属同安县。现同安为厦门郊县。

^② “甲必丹”英文名为“Captain”，乃荷兰人所创的“首领”制度，意即当地居民头目和行政负责人。

义子。辜鸿铭从小受西式教育，曾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主要学英语。13岁左右，即1869年前后，他由布朗夫妇带往欧洲留学。

辜鸿铭在西方共呆了十一载。先到英国留学。1873至1874年之交，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顺利通过了拉丁语、希腊文、数学、形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诸多科目的考试，以优异成绩荣获文学硕士学位，时年方21岁。^①此后他又曾到德国某工学院进修，获工科文凭。^②接着在法国巴黎大学、意大利等地游学，1880年24岁时返回槟榔屿，被派往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三年后，他在新加坡得遇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三日晤谈，遂辞去殖民政府职务。从此留心蓄发养辫，改穿长袍马褂，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倾心向慕祖国文化。随后转往香港居留。在香港，他继续学习中文，攻读中文书籍和儒家经典，同时广泛浏览研究西方汉学著作。这一时期，他还开始以英文发表文章，对西方汉学进行批评，正式揭开了其文化活动的序幕。中法战争期间，他结识张之洞的幕僚杨汝树，经杨和张之洞的另一幕僚赵凤昌引介，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主要负责译述情报和礼宾工作，历时近20年。在这期间，他曾协助张之洞创办兵工厂，为其延聘各种教习等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活动，

^① 关于辜鸿铭在英国留学的情况，众说纷纭，有不少误传。经调查，大体以此说为确。

^② 一说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曾获得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另外，还有人说他从欧洲带回了十三个博士头衔。（可见杜英穆：《崇古好辩的辜鸿铭》、台湾，《别传丛书第五种：学术名家别传》第76页）我个人认为这是误传。辜氏本人从来不曾公开表示过他曾获得博士学位。他的所有书都署名为“辜鸿铭硕士”，即使在传说他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亦然。说他获得博士而不张扬，这不符合辜氏的性格，更何况那么多学位呢？20年代，不少中外人士都称他为辜鸿铭博士，他似乎坦然接受了。可能当时有西方某些大学授予过他博士荣誉称号，待查证。不过他回国时没拿到博士学位，似可肯定。

是以英文译述儒家经典，著书立说，向西方宣扬儒家文化，为晚清政府辩护，并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及其西方文明。长江哥老会排教暴动和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的英文文章及著作，都曾在西方引起轰动效应。1905年经张之洞和周馥举荐，出任黄浦江淞治局督办。随后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晋升郎中，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以其为“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同榜中严复居首，他位在第二。年底，他辞去外务部职务，出任南洋公学监督。

在晚清，辜氏在政治上基本上属于洋务派。他既反对戊戌变法，也反对辛亥革命，曾撰文著书屡以攻击。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甘，至死与民国作对，诅骂新生事物，并留辫不剪，与世抗争。1917年张勋复辟，他卷入其中，负责外交联络，被列名为外务部侍郎。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不避其顽固保守，聘其为北大教授，主讲英诗和拉丁语。五四前后，辜氏仍不懈地以中英文著书作文，坚持批评西方文化，鼓吹儒教救世救西和中国文化优越论，同时反对新文化运动。在西方，他俨然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在中国则成为“新青年”们抨击和嘲讽的顽固象征。1924年，他曾被邀往日本讲学，主讲东西文化。1927年回国。其间曾被张作霖聘为顾问，也曾应其宗弟辜显荣之邀到台湾演讲。1928年，张宗昌任命他为山东大学校长，但并未到任。同年4月30日，他在孤寂和抑郁中因病去世，

辜鸿铭被聘为张作霖顾问一事的详情，可见日人萨摩雄次编《辜鸿铭论集》中《追忆辜鸿铭先生》一文。据他说，辜氏在日讲学期间，收到张作霖聘其为顾问的电报，为不负张氏的“诚恳相邀”，于1925年初夏一度回国。曾四次会晤张作霖，后因见解不合，辞职未就。

享年 72 岁。^①

综观辜氏一生，其政治生涯实不足措意。他主要是一个文化人物，而且是一个颇为奇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即使谈政治和从事政治活动，也充满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辜鸿铭的奇特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精通西学，却极端保守，即论者所谓：“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②在近代，像辜鸿铭这样自幼西渡，又接受过那么长时间、那么完整系统的西方正宗教育的人已属凤毛麟角，而像他那样聪明、勤学善思的人则更为罕见。在晚清，从张之洞到一般人都一致公认他是“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③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他简直堪称天才，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此外还略懂日语和俄语。

辜鸿铭所通外语的广博是中外闻名、享有盛誉的。1891 年俄国皇太子和希腊王世子来华游历，途经武昌时，就对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身为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席幕僚的赵凤昌，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述：“俄储乘已国兵舰泊汉口，总督以地主礼先往访，关道与中军从。俄储问两从官职名，汤生译以对。顷之送客出，俄随员十人左右立舱口，汤生语俄储，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张督。旋邀宴晴川阁。汤生本以法语通译，席间俄储与希世

关于辜氏的家庭情况，现在人们知之甚少。只知他有一妻一妾。妻子名叫淑姑，广东籍（一说湖南籍），是一个中国旧式的裹脚妇女，辜氏异常喜爱她的“三寸金莲”。妾名叫吉田贞子（又名蓉子），日本大阪人。儿子叫辜守庸，为贞子所生。两个千金是淑姑所产，一名辜珍东，一名辜娜娃，都聪敏好学、精于英文，且像他老子一样性情孤傲。辜鸿铭死后，据说她们两位都到苏州一所庙里削发为尼（见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鸿铭》）。

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 270 页。

③ 见冯天瑜编：《辜鸿铭文集》中所收《读易草堂文集》罗振玉序。

子问答，欲避人知，改用俄语，谓即晚有他约，宜节量。汤生言此餐颇合卫生 愿属餍。客有讶色。文襄吸鼻烟 希世子以为异 用希语问俄储，谓主人鼻烟何物，汤生达之主人，即以鼻烟递世子。两储益骇。临去，俄储郑重握汤生手，约至彼国当敬待，并以镂皇冠之表赠焉。后抵上海，辄告人，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①

辜鸿铭所通外语不仅广博，英德法三语还特别深湛，其中最为精绝的又是英语。其论著主要以英文写成，当中也夹杂着其他语言。他的英文具有维多利亚风格 典雅、风趣、流畅而美妙 几乎所有读过他论著的英美人和懂英语的人们都有同感。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曾评价道：“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②精通英语的林语堂先生，也对辜鸿铭的英文水平大为叹服。认为在中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 二百年来 未见其右。造词 用字 皆属上乘”。^③孙中山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还有半个他没提，有人猜指王宠惠，有人则说是孙中山自喻，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辜鸿铭置于第一，^④可见辜氏英语造诣之深。

辜鸿铭对德语也很精通，能用德语流利地演说和写作。据说还在德国游学时，他就曾小试牛刀，以一手倒读德文报纸的本领，轻松地折服和羞煞过两个歧视华人的德国青年。向他们声言：“你们德国的文字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将报纸掉转，也毫不困难地将

赵凤昌：《国学辜汤生传》，《人文》月刊第 2 卷第 4 期。

转引自姜文锦：《辜鸿铭与林语堂》，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 9 月 22 日。

林语堂：《辜鸿铭集译 论语译英文 序》，《华学月刊》第 6 期。

邵镜人：《同光风云录》，第 242 页。

它读得清清楚楚。”末了，还用“最高雅的德文”将他们训了一顿作罢。^①德国作者帕凯（Aifons Paquet）也曾郑重其事地记载说，辜鸿铭是“第一个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中国人”。^②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无疑为他了解西方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辜氏对于西方文学和宗教也有较深的了解。他熟悉不少西方著名作家的著作和思想，经常在文中熟练地引用他们的言论，同时也经常在著作中颇有见识地谈论基督教及有关西方宗教问题。此外，他还相当了解西方的社会民情，教育体制，政治法律制度，历史、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以及种种社会思潮。辜鸿铭自己对此也颇为自负。他曾在奏中说：“职幼游学西洋，历英、德、法十有一年，习其语言文字，因得观其经邦治国之大略”^③；于彼邦国政民风曾经考察，略识端倪。^④晚年应邀到日本讲学时，他对此更为自负：“我在中国是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对于新时代的新事物的了解要强一些，比起孙中山等人所积累的心得要稍充分些。”^⑤这种自负虽不免过分，但却并非全是无端的吹牛。清廷赏给他文科进士，且仅将其位列于号称“西学第一”的严复之

见空空道人：《辜鸿铭求学时代趣事》。这一故事发生在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上。当时，他旅途无聊，顺便拿起一张德文报纸。或许是心不在焉，或许是有意闹着玩，他将报纸倒着看。那两个德国人就叽叽咕咕地嘲笑他：说他根本不懂德文，还要装样子，这是支那人的怪毛病，云云。于是就有了辜氏上述的一番话。他还真的露了倒读的一手。

见辜鸿铭《中国对于欧洲思想的抗拒：批判论文》德文本（即《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的德译）前言，耶那狄德利希斯出版社1921年版。

^③ 《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见《辜鸿铭文集》中所收《读易草堂文集》第2页和第7页。

鱼返善雄：《译者追记》，见他日译的辜鸿铭《春秋大义》一书。该书日译名为《支那人精神》。

后，便表明了对他西学水平及其地位的承认。

然而辜氏令人惊奇的还不在精通西学本身，而在于他回国后对儒家文化的倾心向化和迅速归服，并且自觉地发展为极端的保守。在近代，有一个很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即不少早期曾积极提倡学习西方，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儒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人，后期或晚年又都格外钟情于这一传统。如严复、王国维、杜亚泉、梁启超等都是如此。对于这种文化现象，不少学者进行探讨，但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尚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文化现象中至少有两点是合乎逻辑的：一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知识或教育，曾使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过相当程度的批判乃至产生过厌弃之感；二是后期或晚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深情中，人们能明显透见其早年传统教育深厚根基的牵引作用。但辜鸿铭的情况却大相径庭。他出国之前几乎没有受过什么传统教育，甚至连汉语都说不很好。回国之初，西方社会多年的浸淫，使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曾十足的西方化。然而他一回国，面对中西文化及其物质文明的强烈反差，居然不曾像严复等人那样在震动之余产生主张改弦更张，追步西方文化的愿望，而是一头扎进儒家经书，优游于传统的社会文化之中，执着“道在是也”的信念，至死不变。

如果说辜氏迅速自觉的文化转换使人感到迷惑，那么他逐渐加强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顽固态度和极端保守，则令人更为吃惊。对于近代中外人士几乎一致公认的中华“国渣”，如西化派代表胡适列举的“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这些所谓中国“独有的宝贝”，辜氏几乎都予以过不同程度的辩护，而且他的辩护范围还延

《信心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第483页。

及到‘辫子’和‘随地吐痰’。在晚清乃至民初，即使是庸陋闭塞，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也赶不上这种‘彻底’的顽固。何况他还是一个对外部世界有广泛了解的人呢？

集中在辜氏身上的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和莫大的兴味。1920年，一个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在向德国人介绍辜氏著作的时候，就曾郑重地提醒读者注意：“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不平常的现象，一个远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现象，即，这个人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然而他的独立的明确的精神却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不仅自己保持其固有的特征，而且他还认识到这一点对东方人民的自我保存也是非常必要的，即踏实地立足于自身古老的文化土地，而绝不削足适履地生搬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西方文化。”^①这后面几句概括不尽确切，辜氏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文化的民族性，毋宁说是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和世界意义。这一点在民初以后尤其明显。但无论如何，精通西学却又固执中国传统文化，却无疑成为他引人注目的重要魅力之一。

其次，辜氏是近代中国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文化思想界唯一发生过相当影响的学人。他一生直接以流利的英文写作，其著作还曾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在西方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名字也一度在西方腾于人口，广为人知。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就曾“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辜氏的著作，并同他通信，向他表示

^① 1920年版德文本《呐喊》译序。

敬意。^①法国文豪罗曼·罗兰也承认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②1921年，英国大作家毛姆访问中国，曾专门去拜访他。回国后写了《中国游记》一书，书中对所见中国名人多有挖苦，惟对辜氏颇有敬惮，并承认曾遭其奚落。游记中有一篇题为《哲学家》的访问记，专门记录了他访问辜鸿铭的故事，生动刻画了一个聪明绝顶而又古怪异常的哲学家的典型形象，使读之者难以忘怀。

辜鸿铭在西方的影响又以德国为最。大战后初期的德国文化界曾一度掀起“辜鸿铭热”。他们成立“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探究辜氏的著作和思想。尤其是哲学界的一些新康德学派人士，对辜氏的推崇甚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曾留学德国的魏嗣銮回忆说，前文所提到的那个奈尔逊教授就是一个他所碰到的“辜鸿铭迷”。他劝魏一定要多读辜氏的书，并告诉他：“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又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直到三十年代，德国大学里仍有不少哲学教师“很敬仰辜鸿铭”。如一位叫米舍(G. Misch)的和另一位叫诺黑(H. Nohe)的便是如此。前者还只是向学生特别介绍辜氏，后者如果他的学生不懂辜鸿铭，便不准其参加讨论。^③其折服于辜氏由此可见一斑。

沈来秋也曾回忆这一时期德国的“崇辜”现象。他说：在德国，“我走过不少城市，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他们一般都对中国人表示好感，对东方文化感到兴趣。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口。”又说：“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

^①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伯爵与中国某君书》，《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

见《托尔斯泰与东方》，《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

^③ 见《辜鸿铭在德国》，《人间世》1934年第9期。

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对于德国的基本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彼时中国社会知名人士，如蔡元培、梁启超等都到欧洲游历，蔡元培并且曾在德国留学过。德国人对于他们的态度，一般是冷淡的，认为他们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化的糟粕而来，是微不足道的。就德国人的眼光看来，他们的见解与辜鸿铭相比，实无共同之处。^①辜鸿铭在欧美，尤其在德国思想界受到推崇的现象，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奇事。诚如一个日本学者所说：“欧美人对于东洋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呈赞词者，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于外交辞令而已。”而对辜鸿铭则真诚推崇，可见其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②

辜鸿铭的思想在日本也曾发生影响。他是近代唯一被正式邀请到日本长期讲学的中国学人。特别是1939—1943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华的需要，曾大肆宣扬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以服务于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这虽是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但究竟何以至此，也是应该予以探讨的。

第三，辜氏是五四时期以前唯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

第四，从文化保守的思想与活动的角度和类型来看，辜鸿铭也具有独特性。他的见识既超出一般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同于洋务派，既不同于国粹派，也有别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

^① 见《略谈辜鸿铭》，《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文史集萃》第4辑。

^② 见平佚译：《中西文明之评》，《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

新儒家，同时与他们又有种种相似的方面。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思想宗旨前后基本一贯，和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想直接沟通，对我们认识整个近代的文化保守思潮，具有着典型的考察价值。

除此之外，辜鸿铭还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思想在近代中国虽影响不太大，但名声却不小。他我行我素，睥睨一切，善辩骂人，诙谐不羁，总之，为人行事处处给人以离奇放诞的印象。在晚清，他的上级和同事说他：“为人荒谬绝伦。”^①朋友则喜称他为“辜老太”，^②在民初，他是众口一词的“北大顶古怪的人物”，^③而讨厌他的外国人则骂他为“辜疯子”。^④辜氏古怪的名声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闻名中外，敬之者誉为“怪杰”（如林语堂）鄙之者以为“怪物”（如胡适）而在他死后则更加扑朔迷离，充满了神秘感。

正由于集多种矛盾于一身，辜鸿铭成为近代文化史上最富魅力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种种奇闻逸事时有人述，至今仍有不少流传于世，使谈者听者兴趣盎然。如辫子的故事，关于纳妾的“茶壶茶杯”理论，及其他为缠足和廷杖等所作的辩护等等。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他顽固的表面，满足于叙述他的逸闻趣事，流于诟病和嘲弄，不曾对他的文化活动和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致留给人们一个纯粹概念化、表面化而缺乏思想内涵的顽固小丑形象。这当然是有欠客观和公平的。

近年来，关于辜鸿铭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但还不够深入，

^② 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977、2528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77页。

莫理循就这样骂辜鸿铭，见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658页。

一个重要的不足是很少利用辜氏的外文著作。有鉴于此，笔者较为广泛地收集了有关辜鸿铭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外文部分，在此基础上，拟对辜氏的文化活动和思想做出较为全面的探索，剖析他的古怪，以期对他做出较为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并藉此加深对有关近代文化问题的认识。

在此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对辜氏的外文著作做一简要介绍：一来这部分著作不易得见，少为人知，且已有不少误传；二来它们实际上也是能够系统反映他文化思想的主体资料。

辜鸿铭曾自称一生写过20部书。^①汉文著作有《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两本。前者出版于1910年，后者出版于1922年。今人冯天瑜合为《辜鸿铭文集》，另辑有《蒙养弦歌》。还有一本中英合璧的汉译英诗《痴汉骑马歌》，20世纪初年上海商务版。除此之外，都是外文著作。我所见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ous*，即《论语》英译，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解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1898年刊于上海。

2.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直译为《总督衙门来书》）封面上同时书汉文名《尊王篇》，乃赵凤昌手笔。该书1901年上海首版。它是辜氏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庚子议和期间公开发表的系列英文文章的合集。1923年曾再版。该书中有一篇题为《为了在中国的良治》，曾以 *Latter-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中国问题的最近札记》）为题，于1901年由《香港日报》社出版过单行本。

3.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① 见毛姆著、黄嘉音译：《辜鸿铭访问记》（即《哲学家》），《人间世》1934年，第9期。辜氏说此话时为1921年，此后所出的书尚不在此列。

Russa—Japanese war(《当今 统治者 请深思 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开始在《日本邮报》上连载,1906年结集于上海出版。主要探讨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4.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宇宙秩序或人生之道》)即《中庸》英译。1904年载于《日本邮报》,1906年于上海首版。此书伦敦曾再版过几次。书名稍有改动,为“*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儒家的人生准则或宇宙秩序),副题为“儒家四书之一,迄今为止人们所知译为‘中的学说’的一个翻译”。同时伦敦版在注解上比上海版要更简炼,并删掉了原译本后面的长附录。

5.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版。1912年再版。主要内容是记述张之洞领导的反对西化的中国文化保守运动,并将其与1833年纽曼大主教领导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有德译本。

6.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民的精神》)封面上同时有汉文名《春秋大义》扉页上又题汉文《原华》,乃梁敦彦手笔。它1915年4月首版于北京,1922年重版。主要阐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这是最能系统反映他文化思想的一部代表作,在当时世界上产生过相当影响,有德、法、日多种译本。我在下文中将予以详细论述。

7.Vox Clamantis(《呐喊》)副题为‘辜鸿铭硕士关于战争及

① 1908年版的《中庸》译本同1912年版基本相同,只是后者书末带有各大报刊的附言,而前者没有。

再版时附上了“一个中国官员致德国牧师的信”,以及辜氏“关于中国皇太后”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和他对德龄所著《在紫禁城的两年生活》一书的书评。

其它的观察和思考”。该书是辜氏在民初发表过的论文集子。原文多以英文写成，也有德文，1917年应德国思想文化界人士之请，合为一集送往德国，由奈尔逊教授译成德文，1920年在莱比锡出版。该书专门发表对基督教、西方教育、报纸新闻、民主等问题及其与欧战关系的看法。同时集中谈到了他研究孔子学说的心得。

8. *Articles That All English Educated Chinese Should Read* (《所有受过英语教育的中国人应读之文》), 1922年北京出版。它是合《君子之道》和《中国人将变成布尔什维克吗》两文而成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反对引进欧西宪法，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不道德，主张保存孔子的“君子之道”。

9. 《辜鸿铭讲演集》(日文)。这是辜氏在日本讲演的论文集。1925年日本出版。主要讲东西文化问题及日本对保存东方文化的责任。

10. 《辜鸿铭论集》(日文)，日人萨摩雄次编译，1941年日本出版。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春秋大义》中选译出来，不过萨氏作为辜氏的好朋友和他讲学日本时的接待者与主要翻译者，对其进行过稍许校订处理。①

① 现所寻得辜氏的著作和他1921年所称的著作数相差甚远。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辜氏随口说来，有自吹成分；二是有不少文章恐怕出过单行本（前面我已提到过一篇）；三是尚有著作未能发现。如辜氏本人在《尊王篇》中曾提到1896年或1897年间他曾著过一书，并从中摘录了一段原文，还说他打算将此书压缩以《中国的治体和公职服务》(“Body Politic and Civil Service in China”)为名出版。1906年《中庸》首版本后面仍说明辜氏此书在准备之中，并注明其副标题是：“关于中国目前政治制度的原理和历史发展的论文”(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resent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China)，但一直未见此书。我认为很可能未能出版。另外，辜氏的译著如《大学》等到底出版没有，也有待考证。我在辜氏“英译儒经论”部分将予说明。

除了以上著作之外，辜鸿铭还于清末民初发表过不少英文文章，散见于《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北京报》，《北京日报》，《北华正报》，《当代》，《泰晤士报》等各种英文报刊上。由于国内的外文期刊残缺不全，查找起来十分困难，我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搜寻。^①至于文章的篇目，在此不便一一例举。重要的篇章，我在论文当中都将提到和引用。

下面，我就主要以上述资料为依据，兼采其他较为可信的有关记述和回忆录，对辜鸿铭这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一生的思想与活动，予以探究。

辜氏不少英文文章未署真名，如较经常的署名“一个中国人”(a Chinese)，也曾署过“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a long-gowned Chinaman)(见《雅各宾的中国》，《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前附文第19页)。这就增加了考证的难度。因为有的外国人也以“中国人”的名义著书作文。如Dickinson Goldsworthy 曾著《中国佬约翰来书》(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1901年首版，后在欧美多次再版，影响很大。《东方杂志》8卷1号译为《耸动欧人之名论》介绍到中国，注明为“一个中国无名氏”所著。此文和托尔斯泰致辜鸿铭的信登在一起。文章观点与辜氏十分相似，很容易弄混。

为了读者阅读和行文的方便起见，本书后面在提到辜氏的上述外文著作和注释出处时，一般直接用其汉文译名。

第一章 走上文化保守之途： 回归祖国与折向传统

作为一个文化保守者 辜鸿铭一生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 就是他如何成为这样一个角色。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把视线聚焦于他回归祖国与折向传统的历史，加以某种透视性的分析。

从马、辜晤谈说起

辜鸿铭回归祖国不同于当时官方派遣出国的一般留学士子，也不同于以各种其它缘由直接从大陆出国而后归国的人们；他最终折向儒家传统时间稍晚，而向慕传统却几乎与回归祖国同步，甚至稍早。这其中值得探寻的个人因素和思想背景。

在导言中我们已经提到，辜氏1880年从欧洲回到出生地槟榔屿，并到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但三年后就辞职不干，决心返回中国，为国效力。在这期间，他和马建忠的一席晤谈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一般认为，这次晤谈对辜氏发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他回归祖国和折向传统的转折点。如吴湘相就指出，与马建忠的三日晤谈，“竟使辜鸿铭人生观及生活方式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即倾心向慕华夏文化，决定返回祖国，研治经史”。^①然而，马建忠同

^① 吴湘相，《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57页。